



## 理论探索

Li Lun Tan Suo

# 社会分层境遇下的意识形态建设

□ 雷锋斌

**摘要：**社会分层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极易由此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分层表现出如下问题：主体地位的变迁导致价值观发生置换，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心理严重失衡，社会矛盾交织和多发冲击了社会和谐与稳定。而要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就需要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意识形态的功能导向、创新发展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关键词：**社会分层；意识形态；功能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原来的“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开始涌现并逐步形成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诸如商业服务人员、职业经理人、私营企业主等）。这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与1978年以前相比较，无论在基本构成成份、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流动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sup>[1]</sup>。

伴随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调整，原有的利益诉求、社会地位、精神追求以及生活方式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凸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因此，如何把握社会分层的规律，使其趋向合理，对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而意识形态在这种分化中应该发挥怎样的功能，进行怎样的调整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 一、社会分层引发的社会问题

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现代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虽然我国整个社会阶层结构还尚未定型，但是现代化国家所具有的所有社会阶层，在中国都已经出现并已经成长到了一定的规模。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2）经理人员；（3）私营企业主；（4）专业技术人员；（5）办事人员；（6）个体工商户；（7）商业服务人员；（8）产业工人；（9）农业劳动者；（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上述划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根据的<sup>[2]</sup>。

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个阶层所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还处于不同的排列组合之中，各阶层的规模还在进行不断的

调整,但是各阶层的位序已经基本确立。与此相伴的是传统的通过身份、户籍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地位的方式已经动摇,社会流动机制已经为每个社会成员向上流动,实现阶层跃升提供了通道。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如影随形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打破,不可避免出现了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转移、财富的积聚、收入的分配、价值观的分野和身份的确立,以及由此集聚和引发的矛盾和社会冲突,并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 1. 社会地位的变迁引发了价值观改变

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价值观反映人们的认知和需求状况。这种需求状况反映的是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即价值关系。价值关系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一定程度上还反映道德价值关系、法律价值关系、政治价值关系、宗教价值关系等,还要受到上层建筑中观念领域和信仰体系影响。意识形态所表述的是其在生存条件下的“想象”关系,因此,伴随着利益关系和分配格局重新调整,意识形态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也会有所区别。虽然价值观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但是它也有选择性和历史性。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对其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生活实践也会教育和改变人。在社会分层过程中,有些人在财富积累地位跃升的欢欣中踌躇满志的同时,有些人却在收入减少地位滑落的痛苦中引发严重的心理失衡。生活的重负和心理的失衡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干预和纠正,就会进一步形成和强化为新的价值观。

### 2. 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心理的严重失衡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系数从0到1排列,数值越大,表示社会贫富悬殊越大,而数值越小则表明社会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越均匀。按照通行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危险状态。基尼系数以0.4作为警戒线,超越此即表示社会已经出现贫富悬殊问题。近些年,虽然我国加快了收入分配改革,力图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多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处于高位运行。如下图所示,2008年达到峰值,以后逐年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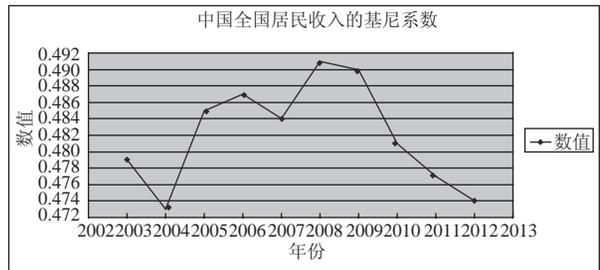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走势图

注: 依据 21CN 新闻网数据整理<sup>[3]</sup>

总体来讲,社会分层过程中,各个阶层上下迁移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个体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别。中国所经历的渐进式改革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基本上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制度设计上的偏差引发的公共政策上的某些失误,致使平衡收入差距和社会财富的杠杆没有得到有效运用,使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在贫富两极分化过程中,由于缺少一种有效的疏导机制以避免社会心理滑向两级——穷人仇富,富人嫌贫,矛盾的累积反而会进一步强化阶层意识和社会认同。

### 3. 社会分层凸现的矛盾冲击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中国的人均GDP于2008年已经突破“3000美元的心理分界线”,达到3400美元,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按照“3000美元的心理分界线”理论,原来通过最优方式配置资源来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求的平衡已经打破,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之外,开始关注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利益分配和关系调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然而阶层差距过大极容易销蚀社会中下层向上攀升的动力,使社会中下层陷入资源困境、社会困境和心理困境三大困境之中,社会矛盾和冲突不降反增,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加之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农民失地、国有资产流失、房价高涨、官员腐败以及强拆等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不仅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而且刑事案件也在不断上升。

刑事犯罪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安全环境,它既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内部关系不够协调,也反映了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加深。中国是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则鸣”、“不公则不安”的国家。据公安部统计,1992年全国公安系统立案的刑事犯罪案158.3万件,2010年597万件,1992年全国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295万件,2010年为1275.8万件,分别



增长 377.1% 和 432.5%。18 年间, 刑事犯罪案件翻了近两番, 治安案件翻了两番多, 年均增长 7% 以上<sup>[4]</sup>。

## 二、社会分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整

马克思认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5]</sup>。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由统治阶级所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基础, 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支柱, 都在为现行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 起到了进行政治动员、贯彻政治制度、促进政治稳定的功用; 与此同时还在扩大心理认同、规范政治行为方面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的社会功能。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有着相近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一致的参政愿望, 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却因各个阶层的差异, 在外显的和谐中潜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使社会这个共同体变的无比复杂。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中, 各个社会阶层的力量相对来说是不断变化的。伴随经济成份多元化而来的是新的经济力量的崛起和原有的经济力量的削弱, 在这种力量的对比和角逐中, 不仅会使原来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解体, 而且积聚起来的社会力量会进一步动摇人们对传统权威的忠诚。加之传统制度的崩溃, 也会导致人们心理上的混乱, 人们原来所固有的忠诚感和认同感受到世俗社会的挑战, 这就有了对新的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再认同的心理需求。社会结构分层化不可避免出现公平和正义一定程度上或者短时间内的下滑, 这就迫使各阶层成员产生了新的群体意识。这就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 并且能够有意识地维护所在群体的利益和要求。正如亨廷顿所说: “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传统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下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sup>[6]</sup>。因此, 对于这种群体意识需要进行疏导, 否则就可能酿成社会大的不稳定因素。

一个社会结构在分层中无论其矛盾的冲突程度如何, 公平和正义能否得到维护, 其过程还是呈现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共同体, 而这个共同体能否向良性的轨道发展进而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社会结构, 又取决于成员对这个组织及其程序的认可和支持的程度。亨廷顿指出: “一个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 取决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又取决于该组织和程序得到支持的范围大小和制度化的

程度”<sup>[7]</sup>。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的历史就一再表明, 一个政党一个集团能否有效地执政, 关键的一点在于社会动员和组织程度。如果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和普遍的认可, 那么事业就会成功, 相反只能是昙花一现, 成为过眼烟云。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获得成功。

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调和功能使其具有超越现实、凝聚人心的作用, 它能够引导社会成员树立共同理想信念, 并为社会活动提供某种价值导向, 因此, 它一定程度上通过疏导社会病态心理, 缓解社会矛盾冲突来调和现有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把矛盾和冲突限制在相对稳定的秩序之内, 并能够为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和程序提供支持力量。历史经验也证明,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定要与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应。因此, 意识形态的建设要与社会分层的特定历史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旋律相统一。

## 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卡尔·马克思毕其一生侧重经济基础, 而马克思·韦伯则强调意识形态, 特别是宗教的作用。就其意识形态理论来讲, 继马克思之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 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列宁将马克思虚假意识的认识论辨析推向了“科学世界观”。葛兰西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 发现了统治阶级如何通过政治治理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交相辉映和密切配合, 来达到控制社会舆论和巩固政权的目的。而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进一步洞悉了意识形态的内在机理, 那就是交相使用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 后者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 而且, 他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统治中的重要性, 他说: “任何一个阶级若不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其中行使其领导权, 就不能长期掌握政权”<sup>[8]</sup>。在社会分层日益显著, 矛盾和冲突更加复杂的现实条件下, 要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要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必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

### 1. 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 用来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



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阶级、社会的意义。价值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般价值观，二是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牺牲型价值观为主的社会，儒家思想能够由一家之言逐渐庙堂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朴素的利他主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进步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社会分层过程中，贫富差距在逐年扩大极有可能走向两极分化，如果不加调节、限制和疏导，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就可能触及社会所能容忍的底线。因此，必须对核心价值观进行调整，也即由牺牲型价值观走向共享型价值观。这种调整的过程一定意义上需要哲学反思，通过反思将牺牲型价值观转变为共享型价值观，从而成为人们认同和信守的共同理想，也是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自觉意识。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国家就要分裂，民族就要解体，更谈不上稳定和发展。所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之所在<sup>[9]</sup>。共享型价值观体现了全人类的社会理想，因为建设一个富足、和谐、共享的社会，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共享型价值观的本质在于平等，意味着应有的权力得到普遍的保障，意味着没有凌驾于普遍之上的特殊，不存在独享。因此，平等是共享的精神实质，包括政府在内，它的合法性也离不开平等。在这个政治共同体内所有成员能够共享财富，共享文化，共享快乐，共享知识。按照民主的理论，政府行为只有代表人民的意志，才具有合法性。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反映政府制度利益的程度。

## 2. 创新发展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具有辩护功能、调和功能、导向功能以及整合功能，不仅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成为西方国家颠覆政权进行颜色革命的有力武器。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甚至认为世界舞台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角逐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和斗争，他在《1999 不战而胜》中坦言：“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竞争，但是美苏对抗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的”<sup>[10]</sup>。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疆域和界限很难阻挡文化入侵和宗教渗透，加之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使人们的观念领域和信仰体系不断受到挑战和侵袭，使信仰体系出现了缺失甚至出现异化。信仰体系原本对道德体系有规范和引导的作用，但由于信仰体系的缺失和异化，催生和加重了社会道德体系出现失范和无序。主要原因在于，在整个社会进行调整的过

程中，人们原来的信仰体系受到怀疑甚至抛弃，而新的信仰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信仰体系出现的真空就很容易被外来和不良的思想观念所填补和占据。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在一个国家中，居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用一整套合理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为自身制度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进行辩护，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遵守和践行。只有当社会成员相信现行的制度是正义且合理的，他们才会心悦诚服，遵守现行国家的制度，维护现行社会的稳定。反之，这种社会制度就难以长久维系。在社会分层过程中，要想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心理失衡，构建社会和谐、保持社会应有的秩序，就必须有效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体到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和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吸收制度红利，善于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使其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国情。

## 3. 意识形态的功能导向

意识形态宣讲的是统治者的世界观，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统治的臣服，要求人们要采用处于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分析现存的制度以及个人的问题。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就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所有意识形态在必然要做出的想象性歪曲中所表述的并不是现存的生产关系，而首先是个人与生产关系及其派生出来的那些关系的（想象）关系。但这种歪曲与马克思所说的扭曲性和虚假性的视角还是不一样的，阿尔都塞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扭曲性的揭露是以阶级观念和阶级情节为参照系而得出的，这种结论可以作为阶级斗争中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持，有利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现在是一个社会分化明显，阶层界限不清，社会矛盾和冲突凸现的时代，还不宜过分突出和强调它的扭曲性功能。因为，原有的社会体系在遭到瓦解的同时，新的社会体系远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当前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应该着眼于确保这个复杂的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和程序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这就需要突出意

（下转第 41 页）

识形态的社会调和功能。如果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扭曲性功能,就对调和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非常不利,反而有激化矛盾的危险。因此,不把意识形态的扭曲性功能与构成性功能区分开来,不承认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理论后果,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理想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球型,而我们国家目前的中间阶层的培育和发展远远不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橄榄球型,另一个则是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型,要走向前者就需要

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旋律,扶持帮助贫弱社会阶层,发展壮大中间社会阶层,稳定保护富裕社会阶层;就需要我们将社会矛盾和冲突降到最低,坚持意识形态的适宜导向,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这种导向应该重点强调的是心理学层面上的心理整合功能,政治学层面上的社会动员功能,社会学层面上的社会调和功能。■

雷锋斌:中北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志毅

#### 参考文献:

- [1]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J].江苏社会科学,2003(4):1.
- [2] 陆学艺.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变迁[J].学习与探索,2005(1):32.
- [3] 中国官方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EB/OL].http://news.21cn.com/hot/cn/2013/01/18/14444679.shtml,2013-1-18.
- [4] 陆学艺.社会建设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98-99.
- [6]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8.
- [7]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2.
- [8] 程越.哲学与政治阿而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38.
- [9] 吴俊清.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统摄和占领[J].北京教育·德育,2013(1):31.
- [10]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114.